



# 普希金全集

1

浙江文艺出版社



肖 马 吴 笛 主编

# 普希金全集

## 抒 情 诗

乌兰汗 等译

1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微亮 王雯雯

舒建华 王晓乐

装帧设计：张妙夫

封面电脑制作：王海明

肖马 吴笛 主编  
**普希金全集 1·抒情诗**  
乌兰汗等译

---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桐庐县瑶琳镇新村路 3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625 插页 4 字数 426000 印数 0001—3000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5339-0936-4/I · 856 定 价：29.00 元

## 普希金与他的创作

高 莽

—

普希金是俄罗斯新文学的创始人。

普希金的诗，特别是他的抒情诗，在俄罗斯可谓老少皆知、家喻户晓。不同年龄、不同思想感情但同是向往真善美的人，在普希金的作品里都可以找到凝炼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心境。尤其重要的是，他的诗倾诉了先进人们的思想和人民的愿望。用卢那察尔斯基的话来说，他把“自己的血化为红宝石，把自己的泪化为珍珠”。

普希金的小说与剧本和他的诗一样，也具有重大的意义。他使当时不受人们重视的小说提高到不容忽视的地位。他使面向官廷的戏剧改为面向人民群众。他塑造的贵族进步青年的形象，妇女形象，“多余”人的形象，农民革命领袖的形象，都为前人所未见，给后人以启迪。

我们阅读普希金的日记、书信和他的评论文章时，处处可以感受到他心灵的颤栗、他思想的剧烈活动和他投入文学艺术斗争的勇气。通读普希金的全集，我们可以了解这位诗人如何摆脱了

西方的影响，超越了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克服了感伤主义，成为俄罗斯文学中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现实生活的教训和艺术探索的实践，促使他继续前进，终于踏上反映广大人民生活的现实主义道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歌唱现实的诗人”，是表现“人类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的作家。

在普希金出现之前，俄罗斯文学远不是“生活的教课书”。18世纪的俄帝彼得一世（1672—1725）大胆改革，打开通向西欧的门户，文学也受到了西欧的影响。先进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若想促进本国文学的发展，必须大胆地改变陈腐的词汇，汲取生活中的语言，反映本国人民的命运，使文学贴近时代。经过几代人近百年的努力，到了普希金，这一历史性的变化终于实现了。

普希金只活了38岁，只从事了二十多年的文学创作，但他却开创了俄罗斯文学的一个新时代，形成了19世纪文坛的一座高峰，引起世界的瞩目。20世纪初，我国也开始提及这位不寻常的诗人。让我们回顾一下他的生平吧！

## 二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的生活时代，正是封建农奴制的俄国处于不得不进行彻底改革的时期。沙皇的专制统治，宠臣的昏庸暴戾，法国的入侵和俄军的胜利，上流社会的荒淫无耻，农奴长期遭受的残酷剥削与压榨，种种触目惊心的矛盾现象，使先进贵族知识分子觉醒起来，并开展了有组织的斗争。

普希金也是贵族家庭的一员，但他的家庭不能归属于先进贵族的行列，他的父亲和他的伯父都是赋闲的上层人物，没有改革不合理的现实的意识。不过他们爱好文学，附庸风雅，家中有丰

富的藏书。他们和当时某些名流，如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卡拉姆津（1766—1826）、茹科夫斯基（1783—1852）、维亚泽姆斯基（1792—1878）等人有交往。这一些都使少年普希金很早就接触了文学，然而他的先进思想的产生不是家庭和长辈的影响，而是社会生活的教育。血缘遗传在他身上也有所作用。普希金身上有黑人遗传因子，他的外貌多少重现了非洲人的特征并非偶然，他的母亲是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人的后代，也许混合的人种为他增加了智商与才气。

普希金的父母几乎从未过问他的成长。读遍全集，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他感念父母之情的文字。他自幼由法籍家庭教师培养。据同代人回忆，普希金儿时的法语比俄语讲得流利，8岁即能用法文写诗。当时讲法语是俄国贵族身份的标志，是上流社会人士炫耀自己的时尚。

普希金12岁时，被送进皇村学校就读。皇村学校是沙皇政府培养特权阶级子弟的一座新型学校。该校主要教授人文科学，学员全部住宿。校址距彼得堡不远，那里风景绮丽，属于皇家离宫苑地，故有“皇村”之称。皇村学校培养了一批沙皇的奴仆，也涌现了一批民族精英。

普希金聪明异常，在校期间并不用功，观察能力敏锐，常以文字挖苦与嘲弄同学和师长，因此，他得罪了不少人，也交结了一些知己好友，如后来成为十二月党人的伊万·普欣（1798—1859），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安东·杰尔维格男爵（1798—1831），还有性格狂热的维利亚姆·丘赫尔别凯（1797—1846）等人。我们在这部全集中，在很多诗篇与文章里可以读到普希金为他们勾画的文学肖像。

普希金早期诗作（1813—1820）囿于上流社会风雅颂诗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影响。他本人过的也是近似浪荡公子哥儿

的生活，风花雪月，饮酒作乐，打情骂俏，玩世不恭。这些表现他毫不隐讳地写入诗中。他说，他是个“年轻的浪子”，“爱世界，也爱它的喧闹”，“憎恶孤独”，“恨争吵，也恨辩论不休，对学习也有点儿厌恶”。他说，他“非常喜欢看戏、跳舞”，“恶作剧方面是真正的魔鬼，扮怪相并不比猴子差劲”，“冒失的举动很多”。

这些话引自他15岁时用法文为自己写的诗，他所勾画的肖像大概维妙维肖。

普希金在皇村学校读书期间，俄国经受了一场巨大的考验——1812年反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这场战争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普希金也不例外。1814年他创作的《皇村回忆》，注入了关注祖国命运的激情，表明他在认真聆听民族的呼唤。翌年初，在考试会上，他朗诵这首诗时，使在场的老诗人杰尔查文（1743—1861）心潮澎湃，感动得涕泪横流。

普希金在皇村学习时，还结识了驻扎在皇村的近卫军骑兵团的几位军官，其中有的人参加过卫国战争，有的人到过国外，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他们思想比较激进，对腐朽而专制的沙皇政府、对万恶的农奴制度恨之入骨。青年军官学者恰阿达耶夫（1794—1856），对普希金的影响尤深，使他接受了不少自由思想。后来，恰阿达耶夫成了著名的哲学家、政论家，他们的友谊持续了一生。

1817年6月，普希金在皇村学校毕了业，分配到沙皇政府外交部任职，被授予十等文官的官衔，其实那是个闲差。

彼得堡是首都，是显贵达官麇集的地方，同时也是进步力量聚会的场所。普希金和其他贵族青年一样，经常在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子里周旋，吃喝玩乐，谈情说爱；同时他也参加进步团体的活动，和同情平民百姓疾苦的文艺界人士交往，探讨祖国的命运与人生的道路。是民主的思想，是眼见的事实，是心灵的驱使，促

成他写下讽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他的奴仆们的诗，并完成了《自由颂》这首光辉的力作。他在《致恰阿达耶夫》的诗中，以掷地有声的诗句写道：

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  
就要上升，射出光芒，  
俄罗斯要从睡梦中苏醒，  
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将会写上我们的姓名！

1819年，他在《农村》一诗中表达了农村必须改革、农奴必须解放的时代要求。普希金的创作像敏感的回声一般迅速反应着社会对专制制度不满与反抗的情绪。

普希金反叛的声音传到沙皇的耳中，引起统治阶层的嫉恨。乌云在普希金的头上聚拢。最后，彼得堡总督下令警察局长搜查他的住宅，查缴他的手稿。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决定把普希金流放西伯利亚，或囚禁在白海孤岛上的索洛维茨基修道院。当时，著名历史学家卡拉姆津和著名诗人茹科夫斯基得知这一消息后，依靠他们的社会声望，四处奔走，为普希金求情，终于改为将他放逐边远的南方。

普希金第一阶段的生活与创作告一段落，开始了第二个阶段（1820—1827）。

1820年，普希金根据俄罗斯民间传说完成第一部叙事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这部富有民主精神和民族色彩的长诗，以其朴实的语言和新颖的形式，对贵族传统文学形成了挑战。

1820年5月初，普希金离开彼得堡南下。这次放逐使诗人有

机会广泛接触民众，贴近生活，认识社会，思想趋向成熟。

普希金被派到南俄移民总督英佐夫将军手下服役。去的路上，他巧遇尼古拉·拉耶夫斯基将军（1771—1829）及随他同行的家眷。这次邂逅为他沉闷的旅途增添了色彩。后来，正是从这位将军的口中普希金得知有关叶卡捷琳娜女皇的种种轶事，关于俄国历次战争的实情和1812年战争的细节。在和拉耶夫斯基一家人共处中，他对将军的女儿们产生了好感，写出不少洋溢着纯情的抒情诗。

普希金到了俄国南陲，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访问了高加索北部、矿泉区、克里木半岛、古尔祖夫等地。绮丽的风光，奇异的风俗，唤起他种种联想，激发了他创作的热情。他在南方时完成了几部重要的长诗：《高加索的俘虏》、《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强盗兄弟》、《茨冈人》，还为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开了头。

普希金在放逐年代还到过基什尼奥夫、基辅和敖德萨。他在南方接近了更为激进的知识分子。当时，欧洲发生了大革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国人民纷纷举起革命的大旗。在这种形势下，普希金的反叛精神像烈火一般燃烧得更旺了，写出了大力支持外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诗篇，如《给黑心乔治的女儿》、《短剑》等。

1823年，普希金被调到总督米哈伊尔·沃隆佐夫将军（1782—1856）手下任职。在蠹臣成群的时代，沃隆佐夫将军曾以学识渊博著称。这位总督本想借助保护名震俄国的诗人为名来提高自己的身价，殊不知普希金并非见势弯腰之辈，对官场上的阿谀逢迎不屑一顾，终于触怒总督，被革除职务。总督以普希金“行为不端”的罪名将他遣回祖籍领地普斯科夫省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让地方官把他监禁起来。

其实，普希金遭贬还有一个原因，即他当时对这位总督的夫

人感情甚笃，为她写了一首又一首情诗，把她誉为美的化身。对照一下普希金赞美总督夫人的诗和讽刺总督的诗，我们就会意识到诗人对善与恶、美与丑的强烈的爱与憎。总督当然不能视而无睹。

从1824年8月到1825年11月，普希金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度过了一年多的幽禁生活。陪伴他的只有老保姆阿林娜·罗季翁诺芙娜。老保姆是位淳朴的真正的民间艺人。普希金从她那里听说了大量的俄罗斯民间故事和歌谣。他觉得每个故事都是一篇迷人的叙事诗。他认为老保姆是他最亲的亲人，他把她写进自己的诗中，还把她写成小说中的一个人物。

普希金在米哈伊洛夫斯克完成了著名的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剧的主题思想是揭示人民与沙皇的关系。普希金认为：历史没有人民参加是创造不出来的，国家没有人民支持也是治理不好的，因此：人民公意不可辱。这部戏剧至今震撼人心。

普希金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结识了普拉斯科菲亚·亚历山德罗芙娜·奥西波娃（1781—1859）。她是毗邻三山村的女庄园主，有教养，聪颖，贤慧，善良。她两次孀居，身边有几个孩子，大多是与普希金年龄相近的女儿和侄女。普希金与奥西波娃结成忘年之交，而他与女孩们则情深意重，甚至产生过真挚的爱情。《焚烧的情书》、《追求荣誉》、《保护我吧，我的护身符……》，以及广为流传的、后来谱成歌曲的《致凯恩》，都是这个时期的心灵之歌。

1825年1月中旬的一个早晨，普希金皇村学校的同学普欣专程来庄园探望禁居的普希金。他们谈了一整天，兴致未尽又继续谈到深夜。他们回忆少年时代同窗共学的日子，也涉及了当时的国内形势。普希金写了一首《给伊·伊·普欣》，称他是“我的第一个朋友，我最珍贵的女人”。普欣当时是秘密革命组织的骨干，

出于对这位民族天才的爱护，不愿意让诗人卷入残酷的政治斗争旋涡中去，因而没有向诗人透露自己的身份。但敏感的普希金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他毫无忌恨地表示：“我并不勉强你说出来。也许你是对的，你不信任我。的确，我有许多轻举妄动的地方，不值得你信任。”两位挚友都没想到，那天是他们最后一次会晤。同年11月，沙皇亚历山大一命归西。皇室为王位的继承问题出现了混乱。佩斯杰利、雷列耶夫等一批先进的贵族军人，包括普欣在内，认为时机已到，便发动了军事政变，目的在于限制甚至推翻沙皇政权。政变发生在12月14日，历史上称之为“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失败了，参加起义的重要成员遭到逮捕，五位主要领导人被处以极刑，普希金的好友普欣被判处20年苦役，充军西伯利亚。在这危难的时刻普希金没有背叛自己的好友，以后，他在任何情况下，面对任何人，也从不否认自己与普欣及十二月党人之间的友谊。十二月党人服苦役时，普希金更加怀念他们。如果在抒情诗《给伊·伊·普欣》中谈到了过去，那么在《在西伯利亚矿山的深处》中则预言了未来：

沉重的枷锁是会被打断，  
监牢会崩塌——在监狱入口，  
自由会欢快地和你们握手，  
弟兄们将交给你们刀剑。

普希金怀着深深的敬意，歌颂了他的同学、同辈、志同道合者和革命的先驱。普希金在悲痛之余，等待官方来逮捕。他清理了自己的笔记，焚毁了与十二月党人有关的手稿。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普希金那时的随笔被他亲手销毁了。1834年，他在回忆中写道：“1821年，我开始写自己的传记，一连写了

几年。1825年末，由于秘密计划不幸败露，我不得不把那些笔记烧掉。那些笔记可能牵联到很多人，甚至可能增加牺牲的人数。我为笔记的销毁感到惋惜，我在那些笔记中提到了一些人，他们后来成了历史人物，我对他们或怀有坦诚的友情，或有过短暂的交往。”普希金曾三次着手写自己的生平随笔。1825—1826年之间他把它们付之一炬。普希金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后一位销毁自己手稿的人。销毁自己的手稿也不是俄国一国的可悲的事实。人类应当如何对待这种教训呢？

沙皇尼古拉继承王位以后，处理国事的手段比其兄亚历山大一世狡猾得多。他深知普希金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有意收买诗人。登基后，他不但没有逮捕普希金，反而亲自召见诗人，并表示要满足诗人的愿望：赐以“自由”。漂泊的生涯和禁居的日子结束了，开始了普希金第三个时期（1827—1837）的生活与创作。

普希金告别了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定居莫斯科。他听从学长茹科夫斯基的规劝，尽量不做触犯皇上的事，不给自己招来新的麻烦。这期间他写了几首诗，如《斯坦司》，美化了沙皇，颂扬沙皇的“光荣和仁慈”；又如《给朋友们》，表白自己“写诗对沙皇由衷地颂赞”。当波兰爆发了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俄国出兵镇压时，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大声谴责沙皇的侵略行为，而普希金竟写诗谴责密茨凯维支，说他是“恶毒的诗人”，说他的诗“为讨好狂暴的无知者浇洒上饱满的毒汁”。这些事引起一些朋友的反感。显然，普希金也有弱点，也有失误。新沙皇表面对他的“关怀”，显示“皇恩浩荡”，收到了一时的效果。普希金是诗人，不是革命家。从普希金整个一生的活动来看。他没有投靠沙皇而始终站在人民一边，正义感使他不能就范于专制体制。正当普希金在沙皇的庇护下享受“自由”时，宪兵团第三科和审查机关则在暗中对

他的创作和活动进行严格的监视。他的剧本《鲍里斯·戈都诺夫》被当局禁止发表；他过去写的抒情诗《安德列·谢尼耶》这时又被怀疑是为十二月党人制造舆论，对他进行传讯。他的长诗《加百列颂》被指控为嘲笑基督，罪名更大。总之，诗人渴求的“自由”实际上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普希金的创作与性格都发生了变化。创作上，他转向戏剧与散文的写作。性格上，他变得孤僻，盼望有个美满的小家庭，过安宁的日子。他向几位女性求过婚，都被拒绝了：有的因为情不投意不合；有的因为他是被官府暗中监视的人。

1828年普希金完成了又一部历史叙事诗《波尔塔瓦》，颂扬彼得一世的功绩和俄军对瑞典的战争胜利。

这一年，普希金认识了娜塔丽娅·冈察罗娃。他向莫斯科这位绝世佳人求婚，对方家长没有表示同意。伤心之余，普希金于当天夜里便启程去了南方。在南方，他投身于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显示了军人之勇。

1830年普希金回到莫斯科后，几经周折，终于得到娜塔丽娅·冈察罗娃的同意，两人订了婚。

订婚后，喜气洋洋的普希金于9月到达鲍尔金诺村，办理父亲移交给他的家产的手续。伏尔加流域霍乱突然流行，交通封锁，诗人不得不在鲍尔金诺村羁留三个月之久。但，这三个月在普希金的创作生涯中是极丰收的时期，文学史上通称为普希金的“鲍尔金诺的秋天”。普希金在那不寻常的秋天里完成了延续八年之久的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写出同情平民阶层小人物命运的《一枪》、《暴风雪》、《棺材店老板》、《驿站长》等合为一组的《别尔金小说集》，创作了四部小悲剧：即《吝啬的骑士》、《莫扎特和萨利耶里》、《石客》、《瘟疫流行时的宴会》；还有长诗

《科隆纳的小房》、《牧师和他的工人巴尔达的故事》以及 30 来首抒情诗和一些评论文章。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他第一个在俄国文学史上勾画出“多余人”的形象。奥涅金的多疑与冷漠，连斯基的幻想与热情，都无济于社会实际。而女主人公塔吉雅娜反而折射出俄罗斯人民的高尚道德和坚韧克制的精神。

1831 年 2 月，普希金与冈察罗娃举行了婚礼。婚礼上，新郎新娘交换戒指时，普希金的戒指不慎落地，手中的蜡烛也熄灭了。有些迷信的普希金意识到：“这一切都不是好兆头。”

普希金结婚时 32 岁，冈察罗娃 19 岁。婚后，他对妻子十分钟爱，写诗赞她为“圣母”。但家庭生活并不理想，也不美满。一则普希金与岳母不睦，二则冈察罗娃的姿色惹人嫉妒，连沙皇见到她之后，也垂涎三尺，特许她经常出入宫廷舞会，为此还授予普希金宫廷近侍的头衔。这个官衔，无论按普希金的身份还是年龄，都极不适宜。诗人认为这是对他的一种污辱。他气愤地说：“我可以做一个臣民，甚至做一个奴隶，却永远不愿做一个臣仆和弄臣，哪怕是在上帝那里。”

普希金一方面应付沙皇“恩赐”的官差，一方面把主要精力用于创作。1833 年他完成了《铜骑士》。这是以彼得堡水灾为背景，又一部描写彼得一世的作品。这部长诗倾诉了普希金对彼得一世的矛盾看法。他赞成彼得一世勇于打开通向西欧的门户进行改革的“国家理想”，同时又对彼得一世的专制制度表示憎恶，认为这种制度已从促进发展蜕化为妨碍进步的阻力。

普希金后期更多地是写作小说。继《别尔金小说集》之后，又完成了中篇小说《杜勃罗夫斯基》，写出了农民的反抗。《黑桃皇后》刻划了彼得堡上流社会的贪婪与野心，预示着资本主义时期的行将到来。《上尉的女儿》描写了俄国历史上普加乔夫率领的规

模最大的农民起义。

1834年法国波旁王朝的党羽乔治·丹特士男爵像一道阴影出现在普希金面前。这个恶少对诗人的夫人百般献殷勤，步步紧追，加上统治集团利用这一机会，推波助澜，终于爆发了一场毁灭天才的决斗，成为文学史上一曲永恒的悲歌。

普希金逝世时年仅38岁。他给俄罗斯人民、给世界人民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即现在奉献给读者的“全集”。

### 三

普希金是第一位被介绍到我国的俄罗斯作家。普希金是在神州大地上第一位被建立纪念碑的外国诗人。

我国先辈于20世纪初开始知道邻国有这么一位不寻常的诗人。这位诗人的名字有过多种译法，如“布雪金”、“普式庚”、“普稀金”、“朴思砼”等，到了近年，外国人名统一译法之后，才在全国通用“普希金”了。

据戈宝权先生考证，我国文献中首次提及普希金是在1900年。那时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一本《俄国政俗通考》中写道：“俄国亦有著名诗家，有名著世经者，尤为名震一时。”这句话中间几个字令人难解，什么是“有名著世经者”？经过反复研究与查寻，戈宝权认为“著”字系“普”字之误。如此，我们可以暂时确定那是中国最早提及普希金的时间。阿英先生在他的《晚清小说史》一书中指出，1903年我国发表了普希金作品的第一个译本。他指的是小说《上尉的女儿》，译者戴翼翠。译者是根据日译本转译的，而日译本又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的。转来转去，添油加醋，前后删减，面目已皆非，小说书名译作《花心蝶梦录·俄国情史》，主人公彼得和玛莎，变成了史密士和玛利，10万字的原作，缩减成3万。严格说，这不是翻译而是重述，是把一部严肃的文学作品改

变成通俗小说，甚至带有鸳鸯蝴蝶派的味道。

“五四”一代中国新文学先驱者们热情推荐与翻译普希金的作品，他们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鲁迅先生是最早评价普希金创作的人。1907年，年仅26岁的鲁迅，综合第二手材料，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有分析有主见地指出，普希金“幼即为诗，初建罗曼宗于其文界，名以大扬。顾其时俄多内讧，时势方亟，而普式庚诗多讽谕……”寥寥几笔勾出了历史背景与作者的倾向。他还分析了英国诗人拜伦对普希金的影响，继而谈到其诗歌的创作成就，最后对诗人晚期某些诗作的不良倾向，借他人之口，有所批判。鲁迅说，普希金从监禁地回到莫斯科后，“立言益务平和，凡足与社会生冲突者，咸力避而不道，且多赞诵，美其国之武功。千八百三十一年波阑<sup>①</sup>抗俄，西欧诸国右波阑，于俄多所憎恶。普式庚乃作《俄国之谗谤者》及《波罗及诺<sup>②</sup>之一周年》二篇，以自明爱国。”

革命先驱李大钊在“五四”初期分析俄国文学的积极作用时，对普希金的诗给予高度评价，特别强调他的《自由颂》，说诗中“一片天真，热情横溢，质诸俄国皇帝，劝彼辈稽首于法律之前，倚任自由为皇位之守卫”<sup>③</sup>。

20年代初，我国出版了几部文学大国的文学史，唯独没有俄国的。鉴于此，郑振铎便参考西方出版的书籍，编写了一部《俄国文学史略》，1924年问世。书中论及普希金时写道：他“诗才极高，格律极美备，叙述极自然”，又说，他“写了许多含有革命思

---

① 即波兰。

② 今通译波罗金诺。

③ 见《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一文，载《李大钊诗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想及讽刺当局的诗歌”。谈到普希金的晚年时，郑振铎说他“又从事于散文的著作。历史小说《甲必丹之女》<sup>①</sup>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还有许多作品也都很有影响。”郑振铎强调指出：“他在巴尔扎克之前，把写实派的精神引进到俄国文坛里。”

1927年，瞿秋白与蒋光慈分部合写的《俄罗斯文学》一书出版了。这两位作者精通俄文，又都在俄罗斯生活、学习与工作过。他们这部书是我国作者根据俄文材料完成的第一部俄苏文学史专著，具有重大的价值。瞿秋白置普希金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中，对他的创作分析得既深刻又独具见解。他写道：“当时贵族少年的奢侈生活，普希金亦不免沾染，可是他从小就有诗才，——少年时的诗作大概取材于爱情、饮酒和一切乐事；然而不久就可以看得出诗人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关心。”瞿秋白在这里谈到了普希金1819年写的抒情诗《农村》，说这首诗讽刺了沙皇，得罪了权贵，因此诗人被流放到南俄，然后又被禁锢于原籍。瞿秋白接着写道：普希金“因流戍却反能多住乡间，与平民生活接触；于是天才日益发露，最后亦曾着手研究历史，曾经试作《彼得大帝》传，对于革命运动尤其留意，如《甲必丹之女》里描写蒲迦赤夫<sup>②</sup>之乱等。普希金一人的文学生涯，正和俄国文学相似，从模仿而独立，从书籍而生活。”瞿秋白关于普希金诗作的分析十分中肯，说他的抒情诗是他的个性的显露，虽有忧伤，却决不悲观。他不忘记现实生活的黑暗，往往自觉精神上的孤寂，他忏悔他的绮年。但“无论怎样黑暗、怎样困苦，我们的诗人决不颓丧。‘光明的将来’维持着他的创造力”。瞿秋白强调“抒情诗中最有意思的是他对于诗的观念。他论诗和诗人——以为诗人是天之骄子，天赋的

① 即《上尉的女儿》。

② 今通译“普加乔夫”。